

试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向公司的扩充

周苇航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商业发展历来与人权保护息息相关。晚近,公司这种经济实体对于人权的影响力愈发强大,由是参与国际核心罪行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目前公司的极端人权犯罪主要依靠各国国内法进行规制,事实上产生了较大的惩治空白;而在国际法层面,通过国家责任监督与个人责任追究,无法真正全面公正有效地约束公司行为。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应当向公司扩充,这样既符合国际刑法相关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满足国际刑事法院技术、政治层面的需求。

关键词:国际核心罪行 国际刑事法院 管辖权 公司责任

DOI:10.16092/j.cnki.1001-618x.2017.04.011

根据国际刑法理论,国际核心罪行包括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三类犯罪。^①这些罪行不仅出现在战争时期,即便在和平年代,围绕国际秩序、综合国力、地缘政治、能源资源、宗教信仰等的相互博弈,也使得局部的武装冲突和人权侵害此起彼伏。

无论是在武装冲突中实施的战争罪,还是要求根据计划一致行动的种族灭绝罪,或是针对平民人口广泛、系统攻击的危害人类罪,它们通常都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完成,换言之,必须在配合中得到策划、监督、资助、实施。该性质令公司这种凝聚个人力量的商业组织形式拥有了成为犯罪载体的可能。公司在极端人

权侵犯行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愈发为人们所认识——不局限于直接实施劫掠公私财产等犯罪行为,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对于利益的追求,它们还可能协助、煽动国际核心犯罪,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以及准军事集团的犯罪行为提供支援。^②

由于许多国家的政府职能、责任和资本资产不断从公共部门下放至私人部门,公司得以进军原先由国家垄断的领域。传统的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趋势,赋予公司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使其得以隐晦地向政治谈判、社会环境的天平施加越来越多的砝码。^③与此同时,实力雄厚的公司逐渐向国家权力较薄弱的地区渗透,其目的

作者简介:周苇航(1984—),女,汉族,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法学院研究人员。

① 参见卢有学《国际核心罪行在我国的立法模式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16页。

② See Nicholas Howett “Responsibility and Compli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London: Business & Human Rights Seminar, 2005, pp. 12 ~ 24.

③ See Stuart Butler: Privatization for Public Purposes, in William T. Gormley: Privatization and Its Alternativ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p. 17 ~ 24.

地基本为发展中国家,这种转移造就跨国公司的兴起,却也为当地带来人权侵害的危机,尤其当涉及某些特定领域,例如军火业、化工业与金融业等,公司往往容易踏入犯罪的禁区。^④因此,对公司侵犯核心人权的暴行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是否可以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扩张达成,事实上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思考。

一、公司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当前国内层面惩治的缺失及成因

目前,有的国家将由公司实施的国际核心罪行归入自身法律体系的管辖范围。大陆法系很大程度上倚赖国内刑事责任机制进行制裁,与之相对,普通法系则压倒性地采用民事,特别是国内侵权法的保护路径。^⑤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曾在其上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道中就国内法救济公司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情况作过统计,结果表明,80%以上相关案件的当事人都选择到其他法域的司法系统起诉,只有极少数直接在侵权行为发生地进行诉讼程序,且常见于发达国家,其中大部分又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例如以推倒旧有体制后重建的法律标准,来审视裁判二战期间公司犯下的人权暴行。^⑥

出现大量域外诉讼本非合理,基于取证调查的便利,公司国际核心罪行的受害者往往更愿意优先在犯罪发生地提起诉讼。但现实中,犯罪发生地通常是承接生产、开采等商业活动

的第三世界国家,致使其诉求最终搁浅。究其原因,乃第三世界国家无法或者不愿意推进诉讼。诉讼之所以无法推进,通常是由于犯罪化的不充分、法律体系的漏洞与司法资源的匮乏,在冲突地带这些缺陷更为显著;至于不愿意起诉,则更多地是国家希望从公司活动产生的巨额经济利益中分得一杯羹,所以在保障其公民人权与吸引境外投资促进经济活动之间做出的权衡。^⑦置身于这种环境,难以想象受害者如何才能从本国的司法系统中寻得公正。

对于在本国获得适当救济抱持的悲观态度,使得大部分受害者转向域外进行诉讼尝试。这些尝试相对集中在普通法系,因为在公司刑事责任较晚产生的大陆法系,尽管在某些承认该刑事责任的国家,理论上可以基于严重侵犯人权而起诉公司,实践的案例却是凤毛麟角;并且大陆法系迄今尚未出现针对公司相关犯罪行为作出判决的案例。^⑧而在普通法系中,最典型的选择便是通过美国的《外国人侵权索赔法》(以下简称《外国人侵权法》)提起相关诉讼。这项关注如何管辖外国人国际违法行为的条文,自1980年 *Filártiga v Peña - Irala*^⑨起即被反复援引,并且逐渐为域外极端人权犯罪的受害者用于控告违反国际法的公司,^⑩尤其在美国联邦法院阐明《外国人侵权法》中的“侵权”囊括反人权暴行之后,它的适用在该领域形成了一

④ See Mahmood Monshipouri, Claude E. Welch & Evan T. Kenned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Ethics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5, No. 4, 2003, pp. 965 ~ 989.

⑤ See Jennifer Zerk: Corporate Liability for Gross Human Rights Abuses: Towards a Fairer and More Effective System of Domestic Law Remedies, Geneva: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13, p. 91.

⑥ See supra note 5, pp. 92 ~ 93.

⑦ See Lynn Verrydt: Corporate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Crimes: An Analysis of the Hypothetical Exte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Mandate to Include Legal Persons, in Dominik Browdowski, Klaus Tiedemann & Joachim Vogel J: Regulating Corporate Liabilit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p. 283.

⑧ See supra note 5, p. 90.

⑨ 630 F. 2d 876 (2d Cir. 1980).

⑩ See Beth Stephens: Are Corporations People? Corporate Personhoo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Rutgers Law Journal*, Vol. 44, No. 1, 2013, p. 38.

系列重要的判例。^⑪

即便如此,迄今为止的相关案件裁决中鲜有针对公司被告较为彻底的胜利。往往在进一步调查前,当事双方已经达成和解,指控的撤销阻碍了案件背后隐藏的问题的更全面曝光。^⑫以 Wiwa v Royal Dutch Shell Co^⑬ 系列案件为例,由于涉嫌针对尼日利亚国内抗议石油公司活动的示威者群体实施危害人类罪,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及其在尼日利亚分部的管理人员和尼日利亚子公司先后遭到起诉。根据原告的指控,涉案公司为保证公司发展“如常”,不仅向组织攻击示威者的尼日利亚警方提供经济援助与后勤保障,而且在审判中,与尼日利亚政府共谋,企图以释放示威组织者为条件换取示威的结束,以及贿赂目击者作伪证。在审判前夕,该诉讼以 1550 万美元的金额和解。^⑭ 必须指出的是,1550 万美元只占壳牌前一年运营总收入的 0.003%。此外,该公司在声明中强调,这笔钱的支付并非是承认其行为有罪的表示,而是出于“人道主义与同情”。^⑮

晚近发展的案例更为适用美国《外国人侵权法》增添了障碍。尽管美国可能且愿意遵守国际法设定的保障人权的义务,但该义务是否覆盖由本国公司甚至非本国公司在域外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尚无定论,^⑯这种法律的模糊使得

国家踌躇迟疑甚至干脆超脱事外。^⑰ 在 2013 年由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受理的 Kiobel v Royal Dutch Petroleum Co^⑱ 中,被告涉嫌协助和煽动尼日利亚政府在该国犯下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即为其提供军队资助与后勤支援,甚至允许该国政府利用其固定资产作为临时据点发动攻击。第二巡回法庭认为,公司违反国际法的责任问题应当根据国际法本身来判断,习惯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公司在习惯国际人权法上的民事或刑事责任尚未得到普遍承认,因此驳回原告的请求。案件上诉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这一判决结果,但却并非继续在国际法基础上探讨国际犯罪中的公司责任,而是将本案焦点转向“《外国人侵权法》是否具有域外效力”之后,得出否定结论。后续类似案件沿用了该案判决理由,认定法庭无管辖权。^⑲ 进而言之,即使美国法院承认《外国人侵权法》的域外管辖权,受害人仍可能会面临无法确定适用的条文、尚未用尽当地救济、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等受理限制之类的阻碍,增加诉讼的风险和成本。

事实上,掣肘发达国家国内法发挥作用的不止来自技术层面。其预防和惩戒公司国际核心罪行的缺陷,与公司——尤其是跨国公

⑪ See David Scheffer: The Impact of the War Crimes Tribunals on Corporate Liability for Atrocity Crimes under US Law, in Charlotte Walker-Said & John D. Kell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uman Right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 154.

⑫ See Xiuli Han: The Wiwa Cas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 No. 2, 2010, pp. 433~434.

⑬ No. 96 Civ. 8386 (KMW) (S. D. N. Y. Nov. 8, 1996); No. 01 Civ. 1909 (KMW) (S. D. N. Y. Sept. 12, 2003); No. 04 Civ. 2665 (S. D. N. Y. Apr. 5, 2004).

⑭ Chris Kahn: Shell settles human rights suit for \$15.5M, Associated Press, <https://business-humanrights.org/en/shell-settles-saro-wiwa-lawsuit-over-1995-execution-of-nigerian-activists-for-155-million>, latest visit date: 30 November 2016.

⑮ Shell: Shell settles Wiwa case with humanitarian gesture, Shell, <https://business-humanrights.org/en/shell-settles-wiwa-case-with-humanitarian-gesture>, latest visit date: 30 November 2016.

⑯ See John Ruggie: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A Framework for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nnovations: Technology,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Vol. 3, No. 2, 2008, p. 193.

⑰ See Kathryn Haigh: Ex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Jurisdiction to Corporations: Overcoming Complementarity Concer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14, No. 1, 2008, pp. 199~219.

⑱ 642 F.3d 379 (2d Cir. 2011); 132 S. Ct. 472 (2010).

⑲ 参见杜涛《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载《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2期,第89页。

司——带来的利益驱动密不可分。详言之，一些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和实现其全球经营战略，坐拥一种“无责任的权力”，在把公司本身的成本外部化即转嫁给东道国社会的同时，使得母国得以坐享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⑳

以上分析解释了为什么真正因涉嫌严重侵犯人权而被各国定罪量刑的公司大大低于被民间社会团体以及国家或联合国专门机构曝光的数量。^㉑ 鉴于国家在商业与人权的交叉领域对此类犯罪追责的困难与犹豫，超脱个体国家、立足国际层面创建管辖与惩治公司极端人权犯罪的机制，实属当今国际社会的必要举措。

二、公司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现有国际层面的惩治路径及局限

目前，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国际刑事法院，皆未将公司作为其管辖客体；换言之，公司无法在国际层面作为被告受到直接起诉。若仅就现有体制而言，规制公司侵犯人权的极端行为有两种主要路径：或者通过国际法院追究国家责任，由外部规范、制裁；或者通过国际刑事法院与特设刑事法庭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由内部威慑、整改。^㉒

（一）针对国家采取的措施

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长期以贯彻联合国主要宗旨为目标。^㉓ 因为只接受国家间争端，在极端人权侵犯方面，国际法院必

然关注违反相关公约规定的国家行为，相应地将事件所涉公司主体置于焦点之外。例如，在刚果共和国诉乌干达案中，2015年12月19日作出的最终判决虽然提到一家名为“维多利亚”的钻石开采公司，却仅仅指出它获得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的准许、不受影响地在刚果的布尼亚等地区从事经营活动，^㉔此外再无言及。当然，当下的忽视并不排除未来国际法院在判决中作出明确要求、将一些公司的极端人权侵权行为纳入国家责任内涵的可能。然而，单凭国家责任途径向公司施加约束又是否合适？

从管辖内容来看，国际法院只审理各国根据主权自愿向其提交的争端，然而这类行为的发生地多为能力不足、意愿不够的外资友好型国家，以历史上的南部非洲国家为典型，它们常常放任大型公司在人权问题上的肆意妄为，甚至受益于此。^㉕ 故受害者寄望于借助国家力量来提交争端，无异于放虎自卫。

再者，公司实施受任何具有一般良知公民谴责的极端人权侵权行为后，由国际法院裁决招致的惩罚（如赔偿金）却由该国全体国民承担，这种将违背公民意志的犯罪简单归责所导致的处罚，颇失公允；并且，难免会使人们对如此追责的效果产生质疑：认定国家责任是为了从外部环境向公司施压，然而有数量庞大的公

^⑳ 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法中“社会立法”的勃兴》，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第143页。

^㉑ See Wolfgang Kaleck & Miriam Saage – Maa?: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mounting to International Crimes: The Status Quo and Its Challen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8, No. 3, 2010, pp701.

^㉒ See Steven R. Ratner: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A Theory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11, No. 3, 2001, pp. 443 ~ 545.

^㉓ 《联合国宪章》第1条规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charter/chapter1.htm>，访问日期：2016年11月30日。

^㉔ The sentences are as follows: “In this regar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mentions a company referred to as ‘Victoria’, which operated, inter alia, in Bunia. In particular the Report indicates that ‘General Kazini gave specific instructions to UPDF Commanders in Isiro, Bunia, Beni, Bumba, Bondo and Buta to allow the Company to do business uninterrupted in the areas under their command’.”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16/10455.pdf#view=FitH&pagemode=none&search=%22Congo Uganda 2005%22, latest visit date: 30 November 2016.](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16/10455.pdf#view=FitH&pagemode=none&search=%22Congo%20Uganda%202005%22%22%2C%20latest%20visit%20date%3A%2030%20November%202016.)

^㉕ See Emeka Duruigbo: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and Liability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buses: Recent Changes and Recurring Challenge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ol. 6, No. 2, 2008, p. 249.

司在某一国领土设立总部,股东却分散他国,营业地甚至遍布世界,加之其发展中的经济溢出效应日渐显著,愈发地脱离一国控制、模糊国籍身份,在极端的例证中,公司甚至可能越俎代庖,在他国领土建立实际控制。²⁶ 一国凭己之力何以有效地监督这些四处开枝散叶的经济实体?

(二) 针对个人采取的措施

国际刑事法院在管辖、审理极端侵犯人权行为时,已经意识到作为犯罪主体的组织在其中的特殊地位。其直接法律渊源《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5条规定的国际核心罪行,通常都要求集体行为。其中两个罪行甚至在首要条件中,明确要求集体因素,²⁷其余罪行亦在司法实践中也多有涉及相关内容。²⁸ 尽管如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未扩张至包括公司在内的组织实体。处理这类广泛、系统或者大规模实施的犯罪时,国际刑事法院的思路仍以“个人刑事责任”为本位的,仅限于将责任加诸参与罪行实施中级别较高的个人,即令该特定个体为集体组织的行为负责。²⁹

采用这种思路来处理公司进行的这些挟带集体色彩的罪行,极大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对严重人权侵犯的犯罪责任的追究难以成功落实,一些参与其中的组织甚至可能没有任何成员被追究责任。具体而言,或许从一系列单纯的个

人行为拆分来看,无法确立其中任何一个行为个体的个人责任,然而它们经过叠加之后,却可能合成犯罪行为——反之亦然,公司无法约简为其员工简单相加的总和。³⁰ 这种整体大于各部分简单总和的观点并不新鲜。查尔斯·阿伯特早在1936年就曾指出“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特质,使其有别于组成它的那些个体。‘团体人格’要异于同时大于……其各部分总和。这与一栋房子价值高于一堆材料和一支军队力量大于一批乌合之众同理。公司组织是一个能力、价值高于一群人的客观存在。”³¹

更何况,公司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系列的磋商和与不同利益集体的妥协来达致合意,故与其说组织的决定是某些个人的偏好指示,不如说是团体通过相应机制产生的。有研究表明,假设对组织的重大决策根据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投票机制进行表决时,即便个人投票者的选择是希望维持一致,但投票程序的变更却有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这从侧面证明了集体决定未必会受制于组织中任何一个个体的倾向。³² 尤其现今公司规模日渐庞大,内部结构也愈发复杂,要搜寻隐匿在公司面纱背后真正为犯罪负责的特定个体往往十分困难。³³

也正因如此,集体组织的罪行与个体的作用、过错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匹配、相称。从这个

²⁶ See Nick Butler: *Compan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rvival*, Vol. 42, No. 1, 2000, pp. 149 ~ 164.

²⁷ 《罗马规约》中,定义危害人类罪的第7条规定“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定义战争罪的第8条规定“作为一项计划或政策的一部分所实施的行为,或作为在大规模实施这些犯罪中所实施的行为”。<http://www.un.org/chinese/work/law/Roma1997.htm>, 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日。

²⁸ See Kai Ambos: *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 and Command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5, No. 1, 2007, pp. 173 ~ 183.

²⁹ See Andrew Clapham: *The Question of Jurisdic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ver Legal Persons: Lessons from the Rome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Menno T. Kamminga & Saman Zia - Zarifi: *Lia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p. 143 ~ 145.

³⁰ See Ronald C. Slye: *Corporations, Veils,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iability*,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No. 3, 2008, p. 962.

³¹ See Charles C. Abbott: *The Rise of Business Corporation*, Michigan: Edwards Brothers, 1936.

³² See supra note 30, p. 963.

³³ See Antonio Verche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Crimina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Lisbon: Ministry of Justice of Portugal, 2002, pp. 103 ~ 125.

角度出发,单独将一人或者数人绳之以法以为公司行为负责,容易出现个人成为公司的替罪羊的风险,导致司法不公正。^④即便认可了这种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路径,究竟会产生多少威慑效果依然有待商榷。如果在公司的个体成员承担诸如监禁等刑事责任的同时,公司实体仍然几乎毫无损地继续自己的商业活动,反而可能是在变相纵容其继续极端的侵犯人权行为。^⑤

三、国际刑事法院扩充对公司严重侵犯人权管辖权的证成

(一) 历史层面的考察

直至2014年之前,包括临时法庭在内的国际刑事法庭都尚未明确对公司的管辖权,遑论对其进行调查与定罪。假如仅对这段历史匆匆一瞥,很可能会得出国际刑法排斥公司责任的结论,进而否定其被国际刑事法院承认的可能。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一旦从历史角度细察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发展,便可以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历史沿革中发现接纳公司实体的趋势,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军事审判。

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反法西斯联盟希望将数千名纳粹战犯绳之以法。为此,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在伦敦通过了著名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作为审判的法律依据。在起草该宪章的过程中,与会者曾建议将部分商事从业者纳入主要战犯的范围。^⑥在随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其余被告均在《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令》的基础上,于1946年至1949年接受占领德国的美、苏、英、法四国在各

自占领区内进行的调查审理,范围涵盖直接或者间接涉入战争犯罪的德国公司负责人——战争中众多大型德国公司积极地支持纳粹体制,通过提供资金、后勤等帮助,在纳粹的犯罪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检方在庭审中坦言,德国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者在支持和推动纳粹体制壮大和犯罪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⑦这一系列被称作“纽伦堡后续审判”的活动,将国际法庭追究责任的对象扩张到以公司名义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不过法庭最终的定罪对象仍未覆盖公司实体,罪名也是参加犯罪组织活动而非参与商业活动。^⑧对此,有学者深刻地发掘了事件背后的史实,继而主张:公司刑事责任被否定乃是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因为国际法在这方面的制度不健全。当时主导后续审判的美国出于冷战前夕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急切地希望与德国建立正常邦交,“支持重建西德经济以树立对自身的拥护”的政治意愿为占领区政府所认同,因此在纽伦堡要对德国公司的审判缺乏应有的政治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公司刑事责任理论在当时不被国际刑事法庭完全采纳。^⑨

该问题在沉寂约半个世纪之后,又复在1998年6月于罗马召开的为期5周的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以下简称“罗马会议”)上再获关注。此次大会旨在最终拟定并通过一个有关建立一个常设国际法院即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以惩治种族屠杀和其他严重国际罪行。在该会全员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④ See supra note 22, p. 474.

^⑤ See supra note 22, p. 473.

^⑥ See Robert H. Jackson: Report of Robert H. Jackson,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litary Trials,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9, pp. 246, 253.

^⑦ See Florian Jessberger: On the Origins of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for Business Activity: I. G. Farben on Tri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8, No. 3, 2010, p. 787.

^⑧ See David Wippman & Steven R. Ratner: International Law: Norms, Actors, Process: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010, p. 135.

^⑨ See Martti Koskeniemi: Between Impunity and Show Trials,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Online, Vol. 6, No. 1, 2002, p. 9.

首先被讨论的正是关于筹备委员会最后文件草稿中将法人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陈述。^④其中拟定的第23(5)条原有如下表述：“除了国家以外，本法院对法人具有管辖权，如果实施的罪行是为这些法人实施的，或者是法人的代理或代表实施的。”^⑤并且在接下来的第23(6)条中，澄清了“法人的刑事责任”并不排除任何因为实施同一罪行导致的自然人刑事责任。^⑥同时在相关的第76条与第99条规定了针对法人的惩罚及其执行方式。^⑦法国代表的发言对该提案进行了说明，并且提议参照纽伦堡军事审判的先例，赋予这个新建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某一特定组织为犯罪组织的权力，希望借此约束成员国采取措施回应国际法院的声明。^⑧

该提案引起激烈的反响，刑法一般原则及刑罚问题工作小组因此决定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最后也是最为完善的一稿以工作文件的形式呈现。根据这份工作文件，只有那些“以追逐私人利润或利益为全部、真实或主要目标的”公司才符合管辖要求，而国家或“其他实行国家意志的公共机构、公共国际机构、在一国国内法下注册和活动的非营利机构”，则被排除在范围之外。该工作文件进而规定，起诉法人实体只能是在自然人实施同一犯罪的情况下，而且必须是该自然人“按照国内法在犯罪实施时已经在注册的法人中处于控制性地位”，并且“以该法人名义，得到其明确同意，在其活动

过程中实施犯罪行为”。^⑨由此增加的种种复杂限制，可以反映当时与会代表对于公司刑事责任的犹疑。

代表间分歧的根源在于当时有许多法域尚未接纳公司刑事责任的概念，一旦突破传统的个人刑事责任主义、扩张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如何适用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原则便会成为棘手的难题。因为若将公司刑事责任纳入《罗马公约》的构想，那么根据该原则，尽管没有在国内法体系中承认公司刑事责任的国家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或民事诉讼，此类案依然会自动落入《罗马公约》第17条项下“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起诉”的情形，从而成为国际刑事法院可受理的案件，导致部分国家的司法主权遭受贬损。^⑩可以预见的阻碍还包括公司如何归罪、如何惩罚的问题等。此外，“国家坚决主张除了它们自己之外的实体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在道德上也令人感到不快”。^⑪

历经三周磋商，与会代表就是否应该扩张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至法人仍然难以达成合意，法国最终撤回提案。不过有学者认为，提议的条文最终没有被采纳，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会议时间的限制。正如工作小组主席指出的：“关于法人刑事责任问题，所有代表都认可这类提案有着重大的价值，但部分代表认为现在引入那个概念可能太过仓促草率。”^⑫

在最终获得会议通过并且于2002年生效

^④ See Office of Leg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Diplomatic Conference of Plenipotentiari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fficial Records Volume III,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2, p. 31.

^⑤ See supra note 40, p. 31.

^⑥ See supra note 40, p. 31.

^⑦ See supra note 40, pp. 63, 77.

^⑧ See supra note 29, p. 146.

^⑨ See supra note 29, p. 147.

^⑩ See Roy S. Le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Making of the Rome Statute,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p. 199.

^⑪ See Albin Eser: Individu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Antonio Cassese, Paola Gaeta & John R. Jones: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Commentary Volume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67, 779.

^⑫ See Anita Ramasastry: From Nuremberg to Rangoon: An Examination of Forced Labour Cas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Lia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No. 1, 2002, pp. 155 ~ 156.

的《罗马规约》中,简单明了地规定了:“本法院根据本规约对自然人具有管辖权。”即法人未被纳入管辖权范围。

然而,应该说,罗马会议讨论中最重大的阻碍在历史演进中已逐渐分崩离析。公司刑事责任在各国得到认可的潮流几乎不可逆转。事实上,英国早在19世纪初便开始审理公司妨害公众的刑事案件,公司刑事责任制度便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扩张完善起来。例如在美国,如果一个雇员在他的雇佣范围内犯罪,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使公司受惠,那么公司便可以被认为需要负刑事责任。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刑法甚至还将犯罪者所属公司的文化作为考量公司是否犯罪的因素,更使得部分犯罪的焦点由个人罪行转移至公司自身。反观欧陆国家一度十分抗拒公司犯罪的概念,但工业化进程中风险社会的出现促使其对公司刑事责任的态度有所松动,后续一系列欧盟立法的颁布也成功推动了相关各国关于公司刑事责任的立法进程。该趋势同样出现在亚洲,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和后续的私人资本流入,中国在1997年修订本国刑法时,便将公司纳入犯罪主体的范围。非洲联盟的成员国会议也在2012年决定将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的管辖权扩大到除国家以外的法人。^④时至今日,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皆在不同程度上确认了公司刑事责任的存在,或者说,公司刑事责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规则。^⑤

(二) 技术与政治层面的考量

就历史发展而言,公司主体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并非空穴来风,并且当初主要的阻碍已经

不复存在。而从技术与政治角度考量,由国际刑事法院采取行动同样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

相较其他责任方式,刑事责任针对造成危害结果的公司行为,除了有罚金等针对公司资产的惩罚措施,还可以根据情节严重的程度,对公司活动作出暂时停业等制裁;在法人实体基于犯罪目的而建立的情形下,责令公司解散作为最后手段,其适用也未可厚非。而刑事责任独具的威慑、警示与预防效应,正是规制极端的人权犯罪所必要的:由于向公司施加刑事惩罚,贬损的是公司整体的利益,波及群体上至股东下至雇员,有利于引导其制定更为严格的公司规范,关注自身行为,防范危害再生。同时,具有对世宣言性效果的刑事责任,可以引导被害人在面对公司侵犯其人权之际,知道如何寻求可能的救济途径,成为被害人的人权保护大宪章。^⑥此外,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扩张至法人,毋庸置疑会对增强追责公平性助益良多,在各国国内相关立法与司法碎片化的背景下,在国内法院不愿意、不能够行使管辖权时,国际刑事法院能发动补充性管辖,对严重人权侵犯行为的公司实施者进行审理;其裁决另一方面能够为各国提供法律指导,进而带动各国完善相关立法、司法,加强法院在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权化国际刑事秩序中与最严重的人权侵犯抗争的作用。^⑦

国际刑事法院目前亟待解决的“退出潮”问题,有可能通过该方向的改革缓解。事实上,布隆迪、南非、冈比亚三个非洲国家于2016年10月底相继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等也紧随其后。该趋势与近年来国际刑事法院日渐显现的司法偏见息息相关。^⑧具体而言,一开

^④ See Alexandra Garcia: Corporate Liability for International Crimes: A Matter of Legal Policy Since Nuremberg, Tula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24, 2015, pp. 97 ~ 129.

^⑤ See Joanna Kyriakakis: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and the ICC Statute: The Comparative Law Challeng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56, No. 3, 2009, p. 342.

^⑥ See Sara S. Beale & Adam G. Safwat: What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Europe Tell Us about American Critiques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8, No. 1, 2004, p. 154.

^⑦ See supra note 50, pp. 36 ~ 37.

^⑧ 袁卿《非洲三国缘何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0/30/c_1119814663.htm, 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日。

始由于受到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激怒,非洲原本是设立国际司法机构的积极倡导者。但自国际刑事法院建立后,缔约的某些非洲国家一直以被告身份出现,而该法院最终定罪的两个案例又恰好是两位刚果军阀;反观一些来自“西方大国”的力量,其随意践踏他国国民的人权却未遭到应有制裁,甚至未被起诉,这种“一边倒”的局面难免招致非洲缔约国的质疑。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曾断言国际刑事法院是持有偏见的“针对非洲的后殖民霸权主义机构”,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则指称其为“选择性的正义”。^④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引入,恰恰能够缓解非洲国家的不满,达致南北双方的平衡。毕竟,直接参与或者煽动、帮助极端人权侵犯行为的多为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而它们的母国往往位于发达的“西方大国”。若对这类经济实体的国际核心罪行实施制裁,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扭转目前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对象的严重失衡,提升其权威,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维护全球国际核心罪行受害者的权益。

四、结论

追逐利益的欲求一直以来驱使着公司游走在法与非法的边缘,特别是在如今公司规模、领域不断膨胀、扩张的情况下,实力拔群的公司甚至选择逾越法律底线,其中牵涉国际核心罪行的行为呼唤着规则的充分约束。

目前主要依赖各国国内法律体系进行的惩治显然无法满足人权保护的要求;而国际层面尚未有司法机构明确将公司纳入管辖范围,如果采用现有路径,难免弊端丛生。在此情况下,扩大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使之及于公司实体,无论从历史沿革的进程或者技术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和期待的合理进路。

Extens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Jurisdiction to Include Corporations

Zhou Weihang

Abstract: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s alway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tatus of human rights. Nowadays, with companies' growing impact on this field, corporate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core crimes has simultaneously become more frequent. Most of these atrocities are dealt with by domestic legal regimes, which in fact leaves behind a legal vacuum.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current design of state or individual liability can hardly be deemed fair and efficient to regulate corporations liable for extreme human right abuses. In this regard, extending the manda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 corporations is a feasible and desirable choice, since it not only follow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but also answers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need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re crime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jurisdiction; corporate liability

(责任编辑:付强)

^④ 刘旭《多国接连表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为哪般?》<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11-18/8068064.shtml>, 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日。